

■ 活化利用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贵州乡村遗产是中华农耕文明延续至今的重要活态见证。千百年来,贵州乡村在顺应自然环境的共识中,通过节制有序的资源利用手段,形成了以农耕为主的聚落形态与生产生活方式。以山地为主的生存环境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共同构成了贵州乡村遗产的重要特征,世居于此的少数民族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逐步形成的传统智慧与价值理念,通过村落选址布局、乡土建筑营造、农业文化遗产,以及民歌、传统技艺、节庆民俗载体与形式代际相传。

贵州是探索乡村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理念的前沿阵地。1983年贵州省文物部门着手民族村寨调查试点,1986年贵州通过《贵州省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单列“民族文化”一章,要求对历史价值高、建筑具有特点、民俗具有特色的典型村寨进行定级保护,率先从立法层面将民族村寨整体纳入了文物保护的范畴之中,同时还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重要的价值载体和特征,增冲鼓楼、朗德上寨古建筑群、地坪风雨桥等相继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1世纪前后,在贵州民族村寨保护的基础上,我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落户贵州,基于中国本土乡村遗产保护实践经验形成的“六枝原则”获得国际认可,提出村民主体的保护理念。2011年8月,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被国家文物局命名为全国首批生态(社区)博物馆示范点,至今贵州已形成国内最大的生态博物馆群,在调查、记录、阐释、保护、传承、利用乡村文化遗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10月,在国家文物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中国·贵州——村落文化景观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召开,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关于“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发展”的建议》,倡导对乡村遗产实行自然和文化、物质和非物质、历史和现代的整体保护,不仅要保护村落赖以生存的田地、山林、川泽及居住环境,还要保护村落文化记忆,保持村落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贵州是深入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程的排头兵。自2012年实施传统村落保护行动以来,贵州共有757个村寨先后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位居全国前列,分布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2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39处,以及600余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2014年,国家文物局启动国保省保集中成片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利用项目,贵州有10个传统村落入选,并于2018年成功在肇兴侗寨召开国家文物局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现场会,肯定了贵州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领域作出的重要探索。2017年贵州出台全国首部针对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地方性法规《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条例》,推动传统村落保护进入法治化轨道。当下,贵州正以“1+4+10”(1个国家示范州、4个国家示范县、10个省级集聚区)为重点,探索因地制宜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路径。

深处西部地区的贵州虽然社会经济水平发展相对滞后,但是由于没有受到大规模的建设性破坏,乡村遗产仍然保留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活态特征。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最为集中、乡村遗产保护最早开始探索的区域之一,贵州走出了乡村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相结合的科学路径,不断探索“村民主体、政府引导、社会助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积累了丰富的保护发展案例与经验。

黔东南州雷山县的朗德上寨,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朗德上寨古建筑群,自20世纪起便坚持以“工分制”的分配方式带动村民获取旅游红利,使得社区内的村民群体最大程度上参与到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展示工作当中。在肇兴侗寨和西江苗寨为代表的整村保护发展案例,不仅文化影响力辐射全国,通过不断探索,也使得旅游发展能够反哺遗产保护,坚定了村民保护的信念,并且使村民能够在本村就业,避免了村落空心化问题。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楼上村古建筑群保护过程中,基于文化景观的视角扩展了村落保护对象范围和价值维度,并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态遗产与社区发展文化席设社区乡村遗产课堂、策划乡村文化展览等教育活动,吸引社区居民和青少年了解乡村,增强社区文化自信。2024年11月,“活态遗产在地化传承”国际研讨会在线上召开,会议期间楼上村小学生为国内外嘉宾进行现场“国保”文物点讲解,引发热烈反响与讨论。成立于2005年的黎平县地扪人文生态博物馆,是在文物部门登记、民政部门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定位为非营利性质的村寨文化资产管理和社区公共服务机构,作为我国第一家民营生态博物馆,地扪生态博物馆在贵州

贵州乡村遗产活态传承的探索与实践

刘邵远
王军

省文物局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二十年来通过馆村合作以及馆校合作两种方式持续推动侗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充分吸引了来自国内外高校、保护组织、民间团体、“新农人”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的参与。

近年来,贵州立足传统村落和乡村遗产资源优势,以活态传承为核心,系统推进文物保护、非遗传承、传统风貌与生态资源的协同保护与乡村振兴事业,在乡村遗产保护管理利用领域成效显著。

其一,系统性保护机制日益完善,通过立法与顶层设计,率先构建起省、市、县多层次传统村落保护法规体系。2021年印发《贵州省传统村落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年)》,提出文化遗产保护、风貌提升等8项专项行动,构建起覆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三线文化等多元文化遗产的村落保护体系。

其二,深入挖掘乡村遗产多重价值,不断推动以农耕文明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延续“贵阳建议”形成的共识,以文化景观理论指导乡村遗产的保护利用,从“百村计划”到“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集聚力”,统筹探索乡村遗产保护利用新模式,重视挖掘乡村遗产在动态演变中的多元价值。

其三,技术创新赋能乡村遗产保护,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在全省传统村落保护修缮中引入数字化与信息化手段。依托三维扫描与无人机航拍技术,完成雷山苗寨、肇兴侗寨等126个村落全域数字化采集,建立“一户一档”数据库,建成495个数字博物馆,实现建筑结构与非遗技艺的永久保存。融合传统榫卯技艺与现代抗震技术,编制相关木质建筑修缮工艺导则,在传统修缮技术基础上引入数字保护监测技术,传统村落与文物建筑的预防性保护有效增强。

其四,文物消防安全基础不断夯实。将“消防基础设施建设”专篇纳入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核心内容,系统推动“六改”工程和消防管网建设。在基层建立起乡镇专职消防队与村民义务消防队,将防火意识融入侗族民歌、苗族粮概,以“鸣锣喊寨”“扫寨仪式”等民俗民间强化责任意识,形成了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意识的贵州村寨消防安全制度保障体系,切实提高木结构建筑安全系数。

其五,社会参与深化拓展。在省内建立“理事会”“议事会”“寨管委”等村民自治组织,发动群众参与乡村遗产保护与村落管理。与此同时,不断推动与高校、国际组织、民间团体的持续合作,开展传统村落保护更新设计、在地非遗传承利用、乡村遗产保护管理等学术研究与保护实践,创新乡村遗产活化利用路径,以用促保,推动在地社区可持续发展。

贵州丰富的乡村遗产资源为中华农耕文明的传承及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支撑和多元的选择。贵州乡村遗产资源特点,促使政府及遗产保护从业人员进一步思考乡村遗产的保护对象,而没有将价值局限在孤立的建筑物或建筑群里。不仅关注村落建筑形态、街巷空间、村落格局和各类生产生活设施、土地利用景观,还将与之相关并对其物质形态产生影响的过程,比如相关的营造活动、农业生产活动、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机制和其他文化习俗等纳入调查研究和保护利用的范围。贵州的乡村遗产保护实践在全国国内开展较早,介入团队最多,饱受外界关注,对于乡村遗产的主体——人和社区的关注和重视逐渐成为田野实践中的共识。贵州乡村遗产保护突破了“静态”保护的局限,始终将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并置考虑,将人与遗产的关系作为保护和发展的切入点,努力使保护融入日常生活实践当中,因地制宜地探索不同类型乡村遗产保护管理利用的路径与模式。

同时也应该看到,贵州在乡村遗产资源旅游开发过程中虽然积累了不少经验,旅游的进入对地方政府和村民收入的提高有着不小的贡献,但是也应警惕旅游业对乡村遗产保护的冲击和对村民利益空间的过度挤压。不应以“猎奇”的心态来解释或歪曲少数民族文化乡村遗产的价值内涵,这样做既损害了村民的情感,也降低了游客的体验。未来应从国家层面赋予贵州的战略定位高度来思考乡村遗产对贵州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潜在贡献和作用。不仅是因为乡村遗产在物质或经济层面上可能作出的贡献——将遗产直接转化为各种商品,而在于它本身在贵州乡村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表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和转型适应能力,以及在精神、情感层面具有的重要影响力,这些都是助力贵州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潜在资源。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工作

湖北古陶瓷修复技艺的地域特性

林戈 张济夏 李奇

2024年12月23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正式公布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湖北省博物馆的“湖北古陶瓷修复技艺”入选。在我国,遗存至今的历代陶瓷文物有着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内涵,是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自21世纪以来,作为保护与展示古陶瓷的主要手段,古陶瓷修复技艺陆续入选我国各地各层级乃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得到了有效保护与传承。

古陶瓷修复技艺与铜瓷、金缮等主要以恢复陶瓷使用功能为目的的修补技艺不同,它是使用化工材料以稳定破损陶瓷的结构,呈现其历史、美学价值。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世界化学工业的飞速发展,大量化工材料应运而生,使粘接陶瓷碎片,补全陶瓷缺损,仿制陶瓷表面质感成为可能。许多古董商暗中聘请具有模型制作、陶瓷烧造等相关技能的艺人用化工材料修复古陶瓷,使古陶瓷修复的美学效果能够达到重现完整原状的程度,从而能在流通过程中获得更高利润。当时在我国,尤以上海的技艺水平最为高超。20世纪50年代,上海民间修复技师进入上海博物馆从事陶瓷文物修复工作,在与文物保护理念的融合中逐步形成体系及成熟的工艺流程,按对古陶瓷干预程度由小及大或修复后的用途分为考古研究、陈列展示和美学流通三种修复技法。

20世纪70年代中期,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师将古陶瓷修复技艺从上海博物馆引入湖北。50年间,四代湖北古陶瓷修复师在认真学习上海博物馆古陶瓷修复技艺基础上,根据湖北地区的气候、人文环境和古陶瓷资源特点,不断增强文化遗产科学保护意识,不断借鉴相关行业材料工具备,不断吸纳最新科技成果,日臻完善,练就了独具一格的湖北古陶瓷修复技艺。与其他地区古陶瓷修复技艺不同,湖北古陶瓷修复技艺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技法与活化形态上都具有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丰富的发展演变经历。古陶瓷修复技艺的发展形态受所在地古陶瓷资源状况和所依托单位职能范围的影响,表现出差异性。湖北有着5000年灿烂的文明史,古陶瓷资源丰富。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分布广泛,先后经历��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等阶段,有大量陶器留存至今,灰陶、彩陶、蛋壳黑陶具有鲜明特色;湖北虽无名窑名瓷,但本土江夏夏湾窑和汉川马口窑等民窑独具地方特色。正因湖北地区名窑多,且处于南北交汇、东通西联的优越地理位置,各个历史时期,国内各地窑口的瓷器在湖北均有出土和流传,越窑、定窑、龙泉窑、岳州窑、长沙窑、洪州窑、建窑、耀州窑、吉州窑、景德镇窑、德化窑等产品比比皆是。近代武汉已成为全国的政治与商贸中心,古陶瓷流通交易繁盛。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师将古陶瓷修复技艺自上海引入湖北后,于1979年随湖北省文物商店从湖北省博物馆内分离,独立经营而开始侧重于美学流通修复;2015

年,湖北省文物总店(湖北省文物商店于1992年更名为湖北省文物总店)改制成湖北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职能由服务于文物流通市场转变为全省乃至全国文博事业单位。自此,湖北古陶瓷修复技艺开始根据不同业主单位的藏品特点开展考古研究与陈列展示修复;2023年,湖北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重新并入湖北省博物馆,古陶瓷修复技艺则用于馆藏陶瓷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据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湖北古陶瓷技艺不断演变完善,共保护修复湖北省内外陶瓷文物3000余件,练就了“全天候”的保护能力,具备对不同来源、不同品种、不同病害的古陶瓷按照其价值内涵进行保护修复的能力。在抢救、保护国有和民间收藏的陶瓷文物、提升博物馆陶瓷文物研究和利用水平、提高民间收藏和古董艺术品市场中的古陶瓷文化及经济价值、传播悠久的中国陶瓷文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科学的技艺实施体系。正是以上的经历,使得湖北古陶瓷修复技艺的传承人们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以用途划分修复技法对古陶瓷保护和利用造成的影响。美学流通修复给人完好如初的艺术满足感,却覆盖了一定的制作工艺与历史信息,容易改变古陶瓷的原真性,造成历史价值的下降;考古研究修复呈现古陶瓷真实面貌,方便开展器物研究,却展示不出艺术价值,利用空间受限;陈列展示修复兼顾真实和艺术性,却难以拿捏干预尺度,容易出现实施逻辑无法自洽的问题。他们意识到最小保护的核​​心是价值保护,只有心怀敬畏之心,遵循最小干预原则,才能真正实现古陶瓷的长久保护与充分利用。通过长时间的摸索,逐步建立起以现状调查与价值评估为基础,以稳定材质与呈现价值为目标,以精工细作与协调可读为要求,以档案记录与预防措施为保障,科学、合理、有效的陶瓷文物保护修复理论与实施体系。针对每一件古陶瓷的经历和现状制定专属的保护修复技术路线,采用本体干预、装置安装、虚拟还原、多器开展等灵活、多样的修复技法呈现价值,提升展示利用效益。如由湖北古陶瓷修复技艺团队完成的,荣获“2022年全国十佳文物藏品修复项目”之一的“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馆藏陶瓷文物保护修复项目”中,就使用了材质养护、陈展装置安装、传统考古研究修复、传统陈列展示修复、传统美学流通修复、3D打印结合传统技艺、使用透明亚克力补配材料结合传统修复技艺、制作仿制品修复与原文物并列展示等8种修复技法。

突出的学术研究风格。与其他地区古陶瓷修复技艺实践呈现多于学术研究的情况不同,湖北古陶瓷修复技艺在长期实践成长过程中,始终坚持实践与学术并举,实现了实物保护与学术成果双丰收。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传承人们共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有《湖北省国有博物馆馆藏陶瓷文物保护及活化研究》《修和集粹:湖北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陶瓷文物保护修复研究与实践汇编》《把瓷玩美:一位古瓷

崤函古道上的邮驿文化遗产

侯俊杰

邮驿文化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交通和信息传递文化。所谓“邮”,是指古代传递文书的人在路上的停宿处,引申指递送函件者,又引申为递送,即今天我们所说的邮政之“邮”。驿,古代指的是供来往送公文的人或出差官员中途换马或暂住的地方,又称为“驿站”。邮驿,作为一种古代遗留下来的交通信息传递文化,往往与交通道路分不开。它是一种以交通要道为载体,以传递信息和情报为主要功能的历史文化。位于三门峡崤函古道上的邮驿文化遗迹与崤函古道的形成和使用密切相关。

崤函与崤函古道

“崤函”一词,最早见于《战国策·秦策一》:“秦东有崤函之固。”“崤”,指崤山。秦岭向东延伸至小秦岭,再向东至今灵宝东部向东延伸部分是崤山主峰,至今陕州区观音堂镇向东分为南北两支:南崤山经熊耳山向东演变为丘陵,直达洛阳伊阙龙门山口西侧;北崤山沿黄河南岸向东北延伸,余脉直逼洛阳北邙山。崤山是黄河与洛河分水岭,其两侧山高峻,山脊陡峭,绵延500多华里,海拔多在1300米以上。它西与秦岭山北相连,东接邙山,南合伏牛,北滨黄河,是崤函地区主要的交通咽喉,也是主要的交通要道。“函”,指函谷关,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匣子)”而得名。历史上的函谷关有三处:一曰秦函谷关,在今灵宝市东北15公里的王垛村,其设置在战国初期的秦国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有:“秦考公掘崤函之阻,拥雍州之地”,又称“旧函谷关”。二曰魏函谷关。建于公元211年,也就是赤壁之战后曹操在西征马超时,途经秦函谷关。由于函谷关崎岖难行,多疑的曹操担心会有埋伏,于是另辟蹊径,在秦函谷关北边的黄河岸边又开辟的关道,史称“魏函谷关”。其三曰汉函谷关,在今河南新安县东。建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因其时的将军杨仆是新安县人,多有战功,但他耻为关外人,奏请汉武帝应准,将秦函谷关移徙到新安县东而建,史称“新(汉)函谷关”。

崤函古道是先秦至今的一条交通要道,是我国古代两周、两汉和隋、唐实行两京制时期沟通长安与洛阳的重要交通干线。该道西起陕西潼关,东至河南新安、宜阳,因其穿行于崤山腹地,山高沟深,崎岖难行,又是必经之地,历史上称它为“两京锁钥”。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以后,特别是东汉时期,都城设在洛阳,崤函古道的作用就更加重要。在丝绸之路干线上,崤函古道又被称为“丝绸之路崤函段”。位于崤函古道东段的石壕段遗址,2014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上22处遗址点中唯一一处道路遗产,是丝绸之路上一段名副其实的“路”。

邮驿与邮驿文化

邮驿文化对社会文明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是

修复师的手迹》《湖北陶瓷》(收录入湖北省委、省政府编纂的大型历史文献丛书《荆楚文库》)《湖北博物馆馆藏陶瓷文物保护与利用研究丛书》(湖北省公益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项目)、电子书《古陶瓷修复理论与实务》(湖北省公益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项目)、文献纪录片《中国古陶瓷修复技艺实录》(“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文献纪录片《瓷气永宝:瓷器保护、修复与创新性再造》(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等专著8部。这些学术成果在古陶瓷及其修复技艺的理论构筑、技法研究、资源调查、利用探索、实践感悟等方面为湖北古陶瓷修复技艺的体系建设与传播推广增添了有力的羽翼。

良好的传承推广能力。湖北古陶瓷修复技艺秉承“尊重古陶瓷本体价值,实施最小干预”的宗旨,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与学术成果,使其具备了良好的传承与推广能力。目前,三代七名湖北古陶瓷修复技艺传承人同时工作在古陶瓷保护修复一线。他们的付出获得了诸多殊荣。一人获“全国技术能手”称号;两人获“荆楚工匠”称号;两人三次获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文物修复二等奖;一人荣获湖北省总工会首届“e有绝活——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十佳绝活奖”。除注重自身队伍的建设外,在湖北省内,他们通过完成荆州博物馆、襄阳博物馆、荆春县博物馆、巴东县博物馆、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等馆藏陶瓷文物保护修复项目,为这些博物馆培养了10余名古陶瓷修复人才。在积极传播技艺的同时,十分重视相关质量标准的编制工作。2024年1月,他们编制的“瓷器文物病害与图示”标准由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并实施,这是湖北省发布的第一个可移动文物保护省级标准。经过多年的耕耘,湖北古陶瓷修复技艺有了全国影响力。2018年,联合湖北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实施了国家艺术基金“古陶瓷修复青年人才培养”项目,为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培训30人。此后,传承人们陆续受邀在北京、黑龙江、辽宁、内蒙古、重庆、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西、广东、海南等多地作古陶瓷保护修复技艺讲座和操作指导,合计培训2000余人次。2021年,传承人参与了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文物局颁布的《文物修复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编制工作。

湖北古陶瓷修复技艺,承载着湖北省博物馆历代古陶瓷修复师对古代陶瓷文化遗产的深厚敬意与用心呵护。它以物为本,融合了传统工艺技法与现代科学理念,使湖北古陶瓷修复技艺更具针对性、有效性和学术性,在修复过程中保留了古陶瓷的历史信息,重现了其艺术价值,为后人研究古代社会生活、工艺水平及审美取向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此次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湖北古陶瓷修复技艺独特魅力与卓越贡献的高度认可,必将激励传承者们加倍努力,为古陶瓷的保护与利用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湖北省博物馆)

上部边长2.5米,下部边长7米,夯筑而成。其二位于函谷关西寨村古道旁的一个制高点上。它东为村舍,西临断崖,北为沟洫,南临古道。台高5米,周长19.7米,为夯土所筑。包含物有战国和汉代的瓦片。其三是一耦桑驿上部的一个制高点——新寨烽火台。这三座烽火台,形制相仿,时代相近,其作用除了通过燃放烟火报告军情以外,还是一种交通路况信息报告设施。因为函谷关内道路狭窄,“车不并轨,马不开鞍”,只有通过两侧的烽火台来报告关道内的行人信息,来告知往来行人通过函谷关古道时只能单向行走。此外,除了前述驿站、烽火台等设施外,在崤函古道两侧还有一些设施:如湖滨区境内的马家店、尸家店等;铺,如义马境内的十里铺、二十里铺、三十里铺等。这些古代留下的与邮驿制度建立有关的痕迹,基本上每隔三十华里左右就有一个。至于各驿站的距离与行程,除紧急的皇帝诏令、军情等急邮件需要时日较短外,一般日行一到三驿,约百里左右。由于崤函古道的特殊地理位置,在两周经汉、到隋、唐王朝实行两京制时期,自然就是沟通长安和洛阳之间最繁忙的一条通道。车马劳苦,昼夜忙碌。繁忙时,甚至还有“堵车塞路”事故发生。《国史补》记载:“浞池道中,有车戛毂,塞于隘路。属天寒,冰雪凌薄,进退不得。日向暮,公私客旅群集,铃铎数千,罗拥在后,无可奈何……”由此可见当时道路的繁忙程度。

尽管这些邮驿设施由于设置年代不同,间隔距离有近有远,但都在今连霍高速和310国道两侧。它们不仅与交通有关,也是一条古代邮驿和信息、文化传递的通道遗迹,构成了崤函古道上一道独特的文化遗产走廊。

崤函古道与邮驿文化的当代蝶变和价值

随着时代的变迁,时移势易,沧桑巨变,今天的崤函古道已经成为亚欧大陆发展战略的一条重要通道。往日崎岖难行的崤函古道已经蝶变为亚欧大陆桥:连霍高速、310国道、高速铁路、陇海铁路等现代化的交通网络;往日依靠快马和烽火传递信息的方式,早已被电报、手机、电话、互联网、汽车、火车等现代信息传递工具所代替,曾经的“一日千里”的梦想已经变成现实。崤函古道上的众多遗迹或消失、或改线、或尚存,也已经蝶变为世界文化遗产或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崤函古道上留下的这些邮驿文化遗迹,不仅证明了它们在历史上曾经的作用与繁忙,也是留给后人的遗产记忆。新时代,要坚持保护、传承、弘扬的创新发展理念,让崤函古道上的邮驿文化得到合理保护和有效使用。一是继续做好考古研究与阐释,挖掘这些邮驿文化的深刻内涵,激活它们的时代价值和遗产活力,让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二是按照文物保护的有关法规和政策,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优化配置,深化创新,保护好这些与邮驿文化有关的烽火台、地名、关名、驿站名等遗产,给后人留下记忆。三是做好邮驿的创造性转化和推介,以旅游开发为平台,遴选有开发价值的景点或景物,赋予它们新时代的价值内涵,做好开发利用,扩大宣传,让它们发挥新的作用。